

● 中国文学

解读沈从文作品的人性内涵

吴道毅

(中南民族大学 文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4)

[作者简介] 吴道毅(1965-), 男, 湖北来凤人, 中南民族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文学博士, 主要从事中国当代小说研究。

[摘要] 建构人性小庙或展示美好的人性, 是现代苗族作家沈从文为自己所设定的文学目标。而在沈从文作品中, 美好的人性或人性美不仅具有独特的内涵, 而且广泛在性爱与人性、道德与人性、社会与人性等多重层面上得到展开, 具有多方面文化意义。

[关键词] 沈从文; 作品; 人性; 内涵

[中图分类号] I206.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881X(2005)06-0774-05

建构人性小庙或展示美好的人性, 是现代苗族作家沈从文为自己设定的文学目标, 也是读者理解沈从文文学作品思想蕴含的总体性线索。对沈从文来说, 建构文学的人性小庙旨在着手民族道德的重建, 以期修复现代社会背景下的人性溃败, 同时展开对人的生命价值的某些终极性哲理探寻。而从创作实践看, 沈从文笔下的美好人性不仅意味着“优美, 健康, 自然, 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1] (第5页), 是一种人性光芒照耀下的人生状态, 而且包孕着较为丰富而具体的内涵, 呈现出多重层面的文化意义。

一、性爱与人性

“人与人之间的、特别是两性之间的感情关系, 是自从有人类以来就存在的。”^[2] (第229页) 在两性关系中, 性爱可谓人性最渊深乃至最本质的内容之一, 既是人类个体的强大生命力、创造力所在, 也是两性爱情生活得以建立的基石。从一定意义上说, 性爱甚至是人的自由本质的体现。自从文明社会开始后, 人类文明的发展促使人的性爱走出了野蛮时代, 但随着文化禁忌的过分膨胀, 性爱也逐渐为文明所压抑, 以至在很大程度上被剥离出文明发展的轨道, 许许多多的人类悲剧也因此产生。受过现代人本思想或西方人道主义精神熏陶的沈从文对此极为不满, 认为这严重破坏了人性的健全或人性的健康发展, 积极主张性爱与人性的和谐统一。为此, 他在文学作品中极力坚持性爱在人类生活中的合理性与审美意义, 强调性爱基础之上自然、健康的情爱生活在人性建构中的重要性与社会意义。

沈从文认为, 性爱是上天赋予人类的自然法则, 也是人类固有的本能。人类最好的选择是以自然、健康的态度对待性爱, 无端地压抑或排斥性爱, 都是与人性相悖的——所谓“天许可的那种事, 不去做也有罪”^[3] (第282页)。因此, 在沈从文笔下, 性爱不仅是人类最原始、本初的生命冲动, 更是人性或人性内涵中不可分割的部分; 青年男女爱欲的流露、性爱的展示正是青春光辉或人性光芒的独特闪现。《神巫之爱》、《龙朱》、《雨后》、《阿黑小史》等大批作品, 不是以浓烈的色调展示男女青年步入青春期后性爱意识的觉醒, 就是以诗意的笔墨渲染青春男女初尝性爱之果的幸福与欢悦。而小说《扇陀》、《爱欲》等作品, 则不仅昭示了情爱与性爱对青春男女无以抵御的强大吸引力, 而且借助佛经中的神话传说证明人性

是神性与兽性的合一。像《扇陀》中的候补仙人与《爱欲》中“母鹿所生的女孩”，之所以均被描写为“母鹿”所生，似乎则是因为作者为了凸现人性中自然“兽性”的一面。而这里的所谓“兽性”，即是人的自然情欲等生理特征的隐喻，也暗示了对人类性爱行为的科学解释。

“女人喜欢被人拥抱和抚摸，尤其是在青春期以后，她渴望在男人的怀抱中成为肉体。”^[4]（第434页）与男性一样，女性也有着正常的生理欲望或性爱要求。沈从文对此是非常认同的，认为汉族儒家文化或封建礼教剥夺女性性爱权利是极其反人性的。为此，强调女性对性爱的合理要求，成为沈从文作品建构人性主题的重要内容之一。在《采薇》及《阿黑小史》中，阿黑姑娘在与男友五明的性爱行为中实际上自始至终掌握着主动权，甚至对阿黑来说，“她需要五明，实在比五明需要还多”。在《旅店》中，寡居3年的苗族女店主黑猫，某一天不仅感到有“一种突起的不端方的欲望，在心上长大”，而且在潜意识里，“她要的是一种力，一种圆满健全的、而带有顽固的攻击，一种蠢的变动，一种暴风雨后的休息”。随后她主动与大鼻子客人去店外野合。与此同时，对沈从文笔下的许多女性来说，失去正常的性爱生活则意味着对和谐人性的背离。在《爱欲》“被刖刑者的爱”一节所讲述的故事中，那位有夫之妇之所以“同刖足男子发生了恋爱”，起因便是“作丈夫的不注意于男女事情”。后来，她甚至因此蓄意制造了将丈夫推下悬崖的事件，与刖足男子结为夫妇。同篇中“弹箏者的爱”所述宋式发之妻守寡后，由于没有得到用琴声深深打动她芳心的弹箏者的爱或包含着性爱的爱情，最后选择了自杀身亡。散文《凤凰》所写湘西苗族老年妇女的放蛊、中年少妇的行巫、青春少女的坠落山洞，实际上深刻反映了湘西女性由于性爱压抑而导致人性扭曲的严重情形，反映了汉族文化禁欲主义所造成的恶果。“父权文明把女人奉献给贞操……性行为，若未经习俗、圣典认可，对于她就是一种过失，一种堕落，一种挫折和一种弱点。”^[4]（第430页）长期以来，中国传统男权文化戕杀了无数女子的热血生命。沈从文作品特地张扬女性的性爱要求与合理欲望，展示女性深层的潜意识结构，描写女性由于缺乏性爱而产生的生活悲剧或爱情悲剧，其对传统文化的强烈叛逆意义是显而易见的。

从总体上看，沈从文提倡或讴歌人类的性爱，却并没有将其等同于两性之间单纯的肉体关系或动物式的肉体关系。对沈从文来说，人类的性爱中包含着爱情，是灵与肉的结合，而不是滥爱，更不是纵欲主义。为此，他还特别推崇纯洁而刚贞的爱情，在作品中展示其独特的魅力。阿黑之所以献身于五明，除了相互间性的吸引之外，她在心底里是爱着五明的。黑猫在追求大鼻子客人之前，曾拒绝了不少给她献殷情的男人；对大鼻子客人，她确系情有所钟。而在《媚金、豹子和那羊》与《月下小景》中，上演的不是白脸苗女子媚金与凤凰族男子豹子为真爱而双双殉情，就是小砦主与女恋人为冲破婚姻陋俗而携手以死抗争。所以，沈从文笔下的两性之爱“不单是延续种属的本能，不单是性欲，而且是融合了各种成分的一个体系，是男女之间社会交往的一种形式，是完整的生物、心理、美感和道德体验”^[5]（第38页）。

二、道德与人性

如果说，性爱是人性中基础性部分的话，那么，道德则在高一级层次上体现了人性在社会生活中的进一步延展。道德既是人类个体的心灵律令，同时也是调节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种行为规范，无论哪一方面都体现了人性的渗透与交汇。而在湘西，原始的农耕文明凝聚了古朴的道德风尚：“兵卒纯善如平民，与人无侮无扰。农民皆勇敢而安分，且莫不敬神守法。……一切事保持一种淳朴遵从古礼”；“每个人民皆正直而安分，永远想尽力帮助到比邻熟人，永远皆只见到他们互相微笑……向善为一种自然的努力”^[6]（第107、138页）。对沈从文来说，优美、自然、健康的人性美同时是一种崇高的道德精神或道德诉求。与此同时，他从处在农耕社会中故乡湘西少数民族人物身上发现了纯朴的人性美或道德精神的美，并在艺术作品中热情地加以表现与赞美。这样，在他的作品中，人性的内涵除了大量地表现在性爱或人的自然属性之外，也突出地在作品人物的道德或社会属性上体现出来。

沈从文十分推崇人性善，并由此强调道德上纯朴的人性或人的内在心灵美。在他看来，道德上纯朴

的人性或人的内在心灵美就是指人的心地的善良、正直、质朴、本真,而无机心,更无邪念。在他的作品中,这种人性美或道德精神的美得到了特别的赞美。《会明》中的会明,虽然“在躯体上”“是一个火夫”,“体魄”强健,但“在心上”却“是一个好人”,特别是性情温厚、“和善”,乃至“天真如小狗,循良如母牛”。他不仅仅工作上几十年如一日恪尽职守,而且为人忠厚有加,不失赤子之心。就是被同伴“拿来当呆子惹”,他却不会随便“发怒”或“动火”,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作家笔下湘西人朴素人性美的写照。沈从文代表作《边城》不惟是女主人公翠翠与傩送兄弟凄美爱情故事的精彩叙事,更称得上边地少数民族古老民风的写生图。就翠翠来说,她不仅有着“一对眸子清明如水晶”、“人又那么乖”的外表、“天真活泼”的性格,更有着纯洁、善良、明镜般透明的心地,乃至“从不想到残忍事情,从不发愁,从不动气”,处处显示出一个民族少女心地的纯真无瑕。她的这种心灵美,与清新、秀美的山水美交相辉映,同时也是湘西少数民族纯朴乡村生活的自然结晶。《三三》中的三三、《长河》中的天天,等等,也都与翠翠一样有着善良的心地,都如同一尊尊心灵美、人性美的雕塑,闪耀着奇异的光芒。

除了内在的自我修养之外,道德关系主要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关系。而这种道德关系,在沈从文看来主要就是一种普遍的人类之爱,是在亲情、爱情、友情等基本人伦之情中凸显出来的人性美。对沈从文来说,在作品中探寻人性美也在于“为人类‘爱’字作一度恰如其分的说明”^[1](第5页),颂扬种种人间真情或真爱的温暖,在讴歌两性之爱的同时讴歌人与人之间自然、和谐的亲情与友情关系。《边城》中翠翠父母过早去世后,外祖父老船夫与翠翠相依为命。维系在这一老一少之间的,则是天然而深沉的亲情与温情。表现在老船夫这边,翠翠简直就是他的生命所在。他给予翠翠的,不仅是生活上十几年如一日对翠翠的细心养护与照料,而且是情感上无私而博大的父爱。由于年老体衰,他特别担心外孙女的未来,以至于翠翠婚事受挫后,急火攻心,忧虑而亡。在翠翠这边,她视外祖父是自己惟一的亲人,而且行为乖巧,懂事听话,生活上充当外祖父的好帮手。外祖父去世后,她则陷入了巨大的悲痛与深深的孤独之中。而在老船夫、翠翠与船总顺顺、天保、傩送兄弟、杨马兵、卖肉屠夫以及过渡人之间,以及他们相互之间,也普遍存在一种亲和、谦让、真诚、信赖、互爱、互助的关系,而毫无虚伪与欺诈。类似《边城》中这种真诚感人的亲情与友情关系,或爱的温暖,还在《长河》、《三三》、《旧梦》、《柏子》等作品中有广泛的表现,并具体地在父女之间、上下辈之间、母女之间、兄弟之间、朋友之间乃至情人之间焕发出无比感人的情感力量。

根据沈从文的理解,人与人之间的道德关系或崇高的道德精神还尤其表现为人与人之间那种超功利或超越金钱主义的交往关系。在沈从文的心中,田园牧歌时代的民族道德古风,湘西民族地区的醇厚民情,更多地从这方面反映出来,并反衬着现代文明社会金钱主义腐蚀下人的道德精神的沦丧。如果说,在《边城》中的小姑娘翠翠身上主要体现了一种天然未琢的人性美的话,那么,在翠翠的外祖父老船夫身上,则更多地凝聚了远古以来急公好义的民族道德精神积淀。老船夫年届70,一生在渡口行船,其方便行人之举堪称“古道热肠”。他履行职责,风雨无阻;因为有“公家”所给的生活费,他便坚拒过渡人另给的船钱,否则,便在船上置办茶水与烟叶予以酬谢;进城买肉,屠夫们出于对他的敬重不愿“接钱”,他却“决不想沾那点便宜”,非要付账方才罢休。在老船夫的精神世界里,金钱、功利等物质杠杆统统让位于对古老的道德信念的坚守。小说中另一人物船总顺顺,由于勤劳勇敢,且行侠仗义,乐善好施,是当地深受民众拥戴的豪杰之士。《船上岸上》里的卖梨老妇人丝毫不想到贪图金钱,乃至买梨的青年直感到她就“像”他“伯妈”一样待他。《长河》中,桔园主人宁愿无偿将桔子送给过路人解渴,也不愿掺进买卖关系。在其看来,桔子是地里长的,过路人吃几个完全是天经地义……

沈从文从道德方面建构人性美在他所处的时代具有迫切现实意义。一方面,他忧虑着20世纪二三十年代包括故乡湘西在内的“农村社会所保有的那点正直朴素人情美”的“消失”^[7](第3页),另一方面,他更是痛恨现代都市“被财富,权势,和都市里的礼貌,道德,成衣人,理发匠,所扭曲的人间”^[6](第151页)。现代文明进程所造成的全民道德水准的下滑,促使沈从文寄希望于民族道德的重建。他在作品中所凸显的道德人性美,既是他对湘西民族地区古朴民风的美好回忆,也体现了他着手重建民族道德的努力。他的作品也因此呈现出一种强烈的田园牧歌色调。

三、社会与人性

人性具有宽广而深邃的内涵, 关涉着性爱、道德, 更与社会息息相关——一切人文科学莫不以探究人性的奥秘为目的。就社会与人性的关系而言, 社会的发展制约着人性的发展, 而人性解放的程度则往往标志着社会或文明发展的程度, 人性的解放更是有赖于社会的进步。对此沈从文也有着自己独特的理解。在他看来, 人性的发展与社会的发展是相辅相成的, 社会的发展应以不阻碍人性发展为前提, 而应为人性的健全提供良好的条件; 如果社会的发展与人性的发展出现冲突, 则应着眼于人性发展来考虑问题。为此, 他通过文学形式进一步从社会及政治生活层面对人性加以了尝试性的诠释。

康德指出: “要把人性, 不管是你身上的人性, 还是任何别人身上的人性, 永远当作目的看待, 决不仅仅当作手段使用。”^[8] (第318页) 如果说, 人是社会发展的目的的话, 那么, 个性的张扬理所当然在人性解放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为此, 像马克思等思想家提出“人的全面发展”将是未来社会的终极性目标, 而新弗洛伊德主义思想家弗罗姆则提出人性的发展乃至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在于“实现”“人的全部潜能”^[9] (第220页)。沈从文深深理解个性张扬对于培养健全人性的重要意义, 他的作品所描写的人性美在很大程度上也在这一点上得到抒发。不过, 在沈从文那里, 个性的张扬是在社会为人类提供的成长环境意义上展开的, 其含义大致是指人性的发展不受僵化的社会习俗或习惯势力所羁绊, 维持一种自然、合理的状态, 而不至于出现畸形或病态。小说《虎雏》与散文《虎雏再遇记》共同描写的虎雏, 是湘西少数民族地区土生土长并在军队里滚爬的青年男子, 有着豪放不羁的个性与雄强的血性。他不愿为书本或礼法所束缚, 行为多率性而为, 而少书生的斯文气; 住不惯豪华的大都市, 而喜欢在湘西的高山深沟里往来奔跑; 一身是胆, 有仇必报, 不畏豪强, 虽不免时而制造流血乃至伤亡事件, 但却并不随意为恶滋事; 年龄虽小, 骨子里却生长着自由奔放的个性。因为如此, 《虎雏》中作家意欲将虎雏培养成城市中“文明人”的意愿最终化成了泡影。作家在《虎雏再遇记》中最终得出的结论是: “一切水得归到海里, 小豹子也宜于深山大洋方能发展他的生命”。对虎雏来说, 人性的展露就是原始、野性、雄强的生命力的本然释放, 社会环境则不能人为地对其加以种种规限, 不然的话, 其结果必将妨害人性的发展, 而且将是徒劳无益的。

人性从社会中所获得的不仅是个性的张扬, 尤其包括人格的尊严。社会要使一个人真正成为人, 离不开对人格尊严的维护。然而, 在现实生活中, 社会最容易造成对人格的伤害, 进而造成人性的扭曲。沈从文描写人性美, 还特别强调人格尊严在健全人性中的独特价值。在他的笔下, 这种人性美主要表现为在社会压抑下受损的人格尊严得到恢复、扭曲的人性得到修复的情形。小说《丈夫》的描述使人看到, 农村经济生活的凋敝以及官府的盘剥, 逼迫妻子不得不通过进城卖淫的方式来养家糊口, 而这种万般无奈之举无论是对丈夫还是对妻子都意味着人格的受辱与人性的严重坍塌。当丈夫一次进城去看望妻子时, 生活与人性的巨大矛盾便产生了。小船上妻子在丈夫面前一再接客, 蛮横的大兵对妻子肆行羞辱、河边的头人水保要求丈夫转告其妻晚上专候他来, 这些事件终于使老实憨厚的丈夫产生巨大的羞耻感、莫名的愤怒以及心底下无言的悲哀, 感到人格上蒙受了巨大的损失。也正是在这一霎那间, 丈夫的人性意识觉醒了, 他扔掉了妻子以这种方式挣来的钱, 更是在艰难的情感斗争中作出了新的选择, 终于在次日早晨带着妻子回到了乡下。这一举动既意味着他们对自我人格精神的捍卫, 也意味着他们人性意识的修复。《贵生》中替财主五爷看守桐山的湘西青年小伙贵生, 与桥边杂货老板的女儿金凤产生了感情, 满怀着对新婚幸福与未来生活的憧憬。然而, 财大势大、情欲膨胀的五爷却强娶了金凤, 突然而无情地粉碎了贵生的美梦, 也恶意地伤害了贵生的人格与尊严。气愤之极的贵生放火烧掉了杂货店和自己的房子, 然后逃往他乡。虽然贵生的这种抗拒没有给他真正的敌人五爷以打击, 贵生也不能明白他的生活悲剧由社会所造成, 但贵生无疑在一定程度上捍卫了自己的尊严。

与个性发展相一致, 人性发展的另一终极性目标莫过于社会的自由。而从一定意义上说, 社会的自由就是超越不自由的社会, 进入一种人人平等、和谐的社会状态。沈从文十分向往这种社会形态, 同时

对阶级社会出现的官僚体制压抑人性的现象十分不满,并进而在艺术上加以表现。小说《七个野人与一个迎春节》极力渲染了湘西地区早期社会自由、和谐的生活图景:山民们男的狩猎,女的纺织,人人都爱劳动,爱生活;没有官僚,没有租税,没有刑罚与杀戮,没有人与人在政治、经济上的不平等关系。这种政治高度自由的生活图景无疑反映了社会发展与人性的和谐,也体现了人性在社会生活中的自由舒展及其完好无损的境界。可惜的是,这些在山野中自由生活的野人最终被官府派军队加以残酷地杀戮,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充满等级秩序与阶级压迫的残暴官僚体制社会,奴役代替了自由,人性被社会完全扭曲。而在散文《怀化镇》《清乡所见》与小说《我的教育》等作品中,作者则以亲历者的身分一再描写与谴责了民国后军队对湘西民众无端杀害的罪恶行径与外来暴力随意戕害人性的严重社会后果,同时隐含了作家对人类自由的真诚呼唤。当然,沈从文所希望的社会自由带有浓厚的乌托邦色彩,它反映了沈从文人性建构的社会理想,同时也暴露了沈从文思想的深刻矛盾。一方面,历史的发展、阶级社会的出现是客观历史规律使然,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另一方面,历史的发展往往以人性的严重受损为代价,人性与社会的和谐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这是历史与人性的深刻悖论。但如果设想回复到远古的原始社会,以此来寻求人性的修复与重建,则无异于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也未免把历史简单化了。

[参 考 文 献]

- [1] 沈从文. 习作选集代序[A]. 沈从文全集:第9卷[Z]. 太原:北岳出版社,2002.
- [2] [德]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 [3] 沈从文. 阿黑小史[A]. 沈从文全集:第7卷[M]. 太原:北岳出版社,2002.
- [4] [法] 西蒙娜·德·波伏娃. 第二性[M]. 陶铁柱译. 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
- [5] [保加利亚] 基·瓦西列夫. 情爱论[M]. 赵永穆,等译. 北京:三联书店,1997.
- [6] 沈从文. 凤子[A]. 沈从文全集:第7卷[Z]. 太原:北岳出版社,2002.
- [7] 沈从文. 长河·题记[A]. 沈从文全集:第10卷[Z]. 太原:北岳出版社,2002.
- [8] [德] 康德. 道德形而上学的基础[A]. 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 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下卷[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 [9] [美] 埃·弗罗姆. 为自己的人[M]. 孙依依译. 北京:三联书店,1988.

(责任编辑 何坤翁)

To Explain the Human Nature in SHEN Cong-wen's Works

WU Dao-yi

(School of Literature, Zhongnan University for Ethnic Communities, Wuhan 430074, Hubei, China)

Biography: WU Dao-yi (1965-), male, Associate professor, Doctor, School of Literature, Zhongnan University for Ethnic Communities, majoring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novels.

Abstract: Constructing small temple of human nature or demonstrating beautiful human nature, is modern Miao national minority writer SHEN Cong-wen's literature goal which is established for himself. But in the Shen Congwen's works, the beautiful human nature or human nature beauties not only has the unique connotation, moreover widely expose in the sexual affection and the human nature, the morals and the human nature, the society and human nature and so on. It thus has multiple cultural significance.

Key words: SHEN Cong-wen; works; human nature; connotation